

丝绸之路背后的动能

把中国文明与西欧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

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十六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十五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同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

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运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内地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有数据表明，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三千多担，值银二十四万两，崇祯八年（1635）达到六千担，值银四十八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超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明清时代，中国的货币改由白银计量，这是重大原因。这就存在一个巨大风险，明清时期国内金融政策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白银的进口盈缩。东南地区甚至因为生产能够赚取“外汇”（白银）的经济作物，而出现

了粮食短缺，需要从北方或者外国进口的情况。

可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这些鸦片多数是英国在东亚或者东南亚殖民地生产的，运销中国十分方便，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历史上中国政府之所以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的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之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历史上“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截至十九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十五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

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之路则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从直接交往的地区而言，十二世纪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与欧洲人的直接往来极其罕见。十三、十四世纪，由于蒙古人的帝国造就了欧亚大陆直接交通的便利条件，使欧洲的旅行家、使节、传教士开始设法进入中国。他们都是通过西亚的陆路前来，进入西亚之后，或者北上俄罗斯大草原抵达中国边境，或者南下波斯湾经过一段海路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而且这些零星来访者在中国多数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区，无奈时间不长且在此工作的欧洲人也很少。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十五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逐渐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十五世纪末期以来，以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通欧洲——印度洋航路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代表的许多航海活动，促进了欧洲各国航海事业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殖民势力扩张活动的加速发展。此时，欧洲人频频由海路造访中国，大多数绕过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也有人经由美洲贯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陆路来华几乎只是俄国人

的专利，西欧各国虽多次努力想从俄国借道，但成果甚微。十六至十八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一个整体的耶稣会士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成为这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成为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从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而言，汉唐时代，影响中国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传入中国的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上是一个中学西传的单向流动过程，虽然经耶稣会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与基督教思想传入中国，但与中学西传的规模和影响相比，可以说很不起眼。相反，汉唐时期佛教入华，无论是东来传法，还是西行取经，也几乎是单向的自西徂东。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主体的工艺性文明则在唐宋时代传到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致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之路，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而编织在一起。

（文/张国刚 来源：《北京日报》）

历史上还有另一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从中国通往欧洲的重要商道。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二是草原丝绸之路，三是海上丝绸之路。然而，除了这三条丝绸之路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另外一条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这条丝绸之路自长安经吐谷浑到吐蕃，然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由此通往欧洲。这条丝绸之路的全线

贯通与中国历史上的和亲密切相关。

隋朝国都大兴（今陕西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国内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通过西安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转运到沿线各国，沿线各国的农产品、工艺品等也经丝绸之路汇集长安后，扩散至国内其他城市。

吐谷浑亦作吐浑，是鲜卑慕容

部的一支，其先祖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内），西晋末年其首领吐谷浑率领所部迁徙到今青海地带，再传至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到五世纪中叶已成为西陲的一个势力较强的古国。

隋朝刚建立时，吐谷浑曾出兵袭击隋的西部边境，但到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下南朝陈都建康，吐谷浑王夸吕不敢再向隋挑衅。

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死，

其子世伏继任吐谷浑首领（591—597年）后，主动派其侄儿无素与隋朝沟通，希望将女儿嫁给隋文帝杨坚。隋文帝因看出世伏“此非至诚，但急计耳”，便找借口予以回绝。他对无素说：“朕知浑主欲令女事朕，若依来请，他国闻之，便当相学。一许一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养，欲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尽管隋文帝并不同意娶世伏的女儿，但希望与吐谷浑建立友好关系。不久，隋文帝就与吐谷浑和亲。

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

帝将光化公主嫁给世伏。世伏在吐谷浑内乱中被杀，其弟伏允被拥立为吐谷浑首领。经隋文帝同意，伏允又和光化公主结为夫妻。从此，吐谷浑向隋“朝贡岁至”，隋也回赐不断。唐与吐谷浑至少有七次和亲，在双方和亲期间，吐谷浑向唐“献马牛羊万”，并决定对唐“比年入朝”。

后来的事实证明，吐谷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通过这几次和亲，东起长安向西经天水、兰州到达吐谷浑的通道被开辟了开来。

（文/崔明德 来源：《北京日报》）

清明谈“柳”：留住春天，也留住生命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同为中华传统节日的节气。经过漫长的历史衍变，清明与寒食、上巳诸节交融为一体，成为春季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清明节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融汇了寒食、上巳诸节的清明节，除了慎终追远、祭奠故人的意义之外，还有踏青、远足、万物更始、催护新生的丰富含义。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带着怀念故人的情感，惟有青青杨柳最能够贴切人们的心境。

清明，是柳树的王朝！“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柳树之名，来源于“留”。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

柳树伐过枝干后，茬口处能够萌生新枝条，而且更利于生长。因此便形成了对柳树的头木作业，即在一定高度截去树冠，促进新枝萌生。这就是柳树的得名的所在。“柳”字与“留”字读音相同，“柳树”就是“留树”，表示保留树干以便可以多次利用的一类树木。

清明时节，插一株柳树，既有对生命不息的期待，也饱含着对逝去亲人永留心中的情感。柳树得春气之先，每年冬春转换之际，当四野还是一片萧条时，总是它最先吐出新绿。它有强大的生命力，柳条入土即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正如俗语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古人重离别，因交通不便，路途多险，每一次出行其实都意味着生离死别。春天折柳赠别，既蕴含着友谊长青的祝愿，同时也喻义着亲人离别去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可随遇而安，顽强生活。西藏的柳树被称作“公主柳”，因文成公主在大昭寺修建时，于寺前亲自栽种从中原带来的柳枝而得名。现如今公主柳在西藏已然广泛种植，只是她的柳枝的长势是向上而非下垂的，虬曲盘结、苍劲有致，是柳树为适应严寒地带环境而顽强繁衍的真实写照。

插柳可以辟邪。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史籍典章

记载，清明节插柳总是与避免疾疫有关的。这也是古代先民，以这种简便通俗的方法提醒人们：随着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各种病菌开始繁殖，各种疫病会卷土重来，要注意个人卫生；僵硬了一个冬天的身体，在外出活动时要注意避免受伤等等。在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插柳辟邪，表示出对健康的追求和期待。

插柳戴柳在一些地方还有纪年华之义，正所谓“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之说（清光绪二年《怀安县志》）。这种习俗是宋代“寒食”冠礼的遗存。宋代将男女成年行冠礼的时间统一在“寒食”节，不论生时年月，“凡官民不论大、小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宋吴自牧《梦梁录》）

戴柳即为成年标志。后世因此便有戴柳以“纪年华”的风俗，并演化成妇女戴柳球于鬓畔以祈红颜永驻的习俗。在此，青青春柳，又有象征青春之义。时值春季，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欲语还羞的妇女们，以青青杨柳作为头饰，传达出对她们青春年华的珍惜与留恋。

“长亭短，叹良辰，杨柳依依送故人。万里鹏程君奋翮，一声骊唱我伤神。”清明的离别，总是让人倍感伤神……好在可以赠柳、插柳，寄托对友谊、亲情的深深不舍和怀念，祈求对春天、对青春、对生命的留恋，祝愿杨柳依依、春光常在、两情长久……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卷！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若干年后，郁郁葱葱的满园绿意向自己、也向每个人弥漫而来的时候，那就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青春，也留住了生命。

（文/任真 来源：光明网）